职业教育深化产教融合机制建设

——基于布迪厄社会实践理论的视角

刘林山

(吉林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吉林 吉林 132021)

【摘要】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党的十九大为职业教育创新发展指明的方向。在从中央到地方密集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推动下,产教之间供需双向对接和融合进展迅速。但受多种因素影响,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仍处于浅表层,“两张皮”问题未能完全解决,合理、有效的机制是不断“深化”的关键所在。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对教育问题的宏观视野和思考契机在教育话题探讨中得到应用。从场域、惯习和资本及彼此关系的独特思维和分析框架阐释产教融合机理,突破对布迪厄理论“碎片化、片面化吸收”的运用和概念工具适用的局限性,从打破产业场域与职业教育场域原有机制的藩篱、构建产教融合场域稳定运行急需的机制、创新产教融合场域可持续发展的机制等方面进行职业教育深化产教融合机制建设。

【关键词】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布迪厄;社会实践理论;机制

【中图分类号】G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794(2022)08-0073-07

一、问题的提出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我国现代职业教育的本质特征、基本制度安排,亦是世界各国职业教育面对的共性问题。德国“双元制”、澳大利亚“TAFE 学院”、新加坡“教学工厂”等产教融合模式都展现出本国独有的职业教育特色。回顾新中国 70 多年历程,党和国家极其重视职业教育产教融合,长期不断地探索“中国方案”。2014 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要“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着重强调,要“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职业教育未来改革和创新发展指明了方向。此后不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

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做出全面部署,并制定“用 10 年左右时间,教育和产业统筹融合、良性互动的发展格局总体形成”的目标。2019 年初,国务院发布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亦称“职教 20 条”)明确提出“促进产教融合校企‘双元’育人”。在从中央到地方密集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推动下,产教之间供需双向对接和融合进展迅速。但受诸多因素影响,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仍处于浅表层,“两张皮”问题未能得到彻底解决。主要原因在于产业界和职业教育界对产教融合本质、生成机理认知差异较大,没能形成共识;促进产业和职业教育之间深度融合、协调运行和成效评价的机制不完善。机制建设是职业教育有效发挥产教融合作用、提升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的首要前提和基础性工作。从国家层面,发展改革委联合教育部等六部委于 2019 年发布的《国家产教融合建设试点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提出要健全协调机制等。教育部牵头九部门印发的《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 年)》也要求“健全以企业为重要主导、职业学校为重要支撑、产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为中心任务的产教融合创新机制”。

针对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机制问题,学术界从不

【收稿日期】2021-10-20

【基金项目】吉林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 2019 年度重点课题“布迪厄实践理论视角下职业教育深化产教融合机制研究”项目编号为 ZD19129;2020 年度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一般自选项目)“吉林省高职教育专业设置与区域产业结构的匹配风险与治理对策”项目编号为 2020B116

【作者简介】刘林山(1974—),男,辽宁铁岭人,博士,教授,兼职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高等职业教育理论与实践。

同理论视角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大量成果。借鉴组织社会学理论,郝天聪等人关注行业企业、职业院校的组织属性,认为“职业教育产教融合问题的产生,与职业院校、行业企业等不同类型组织结构与运行方式的变化密不可分”,提出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向组织内科层关系的适度回归”。^[1]但组织之间具有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在目标、结构和文化方面产教真正实现组织融合比较困难。借鉴博弈论理论,按照“囚徒困境范式”,安东平将产教深度融合模式简化为企业和职业院校“两个社会人”主体之间的问题来探寻相关机制,提出要在职业院校内部构建一个“微模式”,即“双园内嵌、三维联动”模式。^[2]但职业教育是一种典型的“跨界”类型教育,这种缩减方式显然突出了企业和职业院校,却弱化了城市、政府、学生及其家长和其他社会组织等关系主体的作用。例如,作为一种全新的社会评价组织,职业教育培训评价组织在推进1+X证书制度试点工作中扮演着“X”证书及其标准建设的主体角色,是深化产教融合不能够被忽视的重要参与力量。职业教育是与社会经济发展联系最为密切的教育类型。再如,中等职业教育在助力脱贫攻坚和高等职业教育在拓展退役军人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渠道以促进就业、改善生活质量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针对教育问题,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具有独特的关系思维和创新性的“场域—惯习—资本”^[3]理论框架,在教育话题探讨中得到应用。本研究尝试将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机制建设问题纳入社会实践理论分析框架,从场域构建、惯习培育和资本获得及其彼此关系维度审视产教融合形成的机理,突破对布迪厄理论“碎片化、片面化吸收”^[4]的应用和工具适用的局限性,探寻合理的机制建设,有利于克服产教融合“深化”的困难,对职业教育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社会实践理论下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内在机理

1. 场域与职业教育产教融合

在布迪厄建立的社会实践理论体系中,实践的概念可以理解为“行动者在一定的场域中凭借各自拥有的资本,在特定的惯习指导下,为提高自己在场域中的位置以及资本的数量和质量所采取的行动”。^[5]场域(Field)是一个具有统领性的概念,布迪厄从关系的角度给出场域定义,“从分析角度看,一个场域也许可以被定义为由不同的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构成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造。”^[6]从字面上理

解,职业教育同时具有“职业”和“教育”属性。根据场域理论,“职业”能够体现产业场域的岗位(群)要求,对“教育”承担指导、提供实践基础的责任;“教育”处于文化生产场域,体现为跨越边界与“职业”积极互动,对“产业”承担促进、提供人力资本支撑的责任。这既展现了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天然属性,又彰显了类型教育的特色。

在“产教融合”的场域语境下,“产”代表经济场域下的次场域——产业场域。产业是社会分工的产物,是一个具有某种同类属性的企业经济活动集合。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产业的内涵不断充实和丰富,外延则不断扩展,包括农业、工业、服务业及其细分。现阶段,凡是具有投入产出的社会活动都可归为产业范畴。产业场域内存在企业规模效应与企业之间的竞争活力的冲突。“教”代表教育场域,而教育场域的次场域——职业教育场域,是学生群体接受职业教育和培训活动的地方,旨在界定谁能成为从事一个专门化职业的人士。在职业教育场域里,为获得占据某一职位的权力所必须拥有的技能或学业称号的身体形态资本,不同竞争主体总是处于持续的争夺和较量中,处处彰显教育场域的冲突本性。在新一轮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下,产业场域和职业教育场域在国家场域、政治场域、文化场域等多种场域影响下互动频繁,边界由清晰逐渐变得模糊,独立发展的状态被不断打破,场域各因素之间相互不断渗透、不断融合。有研究者认为“产教融合场域是教育场域与经济场域分化与共生的结果”。^[7]在两大场域内部,各自“存在着不同的运行机制、发展策略、行动准则、改革方式及主体构成”。^[8]这种差别或者说“冲突”会阻碍产教融合的“深化”,所以需要找到产教可以融合的关键点。产教融合场域可以理解为行动者在惯习指引下,围绕特定形式的资本——“人力资本”产生冲突和化解的过程,实现教育链、人才链和产业链、创新链(以下简称“四链”)的有效衔接和协同。

2. 产教融合场域内的行动者

布迪厄提出的社会实践理论的独特之处在于把问题和产生问题的行动者在场域内的位置联系起来。行动者在惯习的指引下,依靠各自拥有的资本数量多少、质量高低和结构被分配在场域不同的位置进行斗争。任一场域都具有自身的游戏规则,构成一个潜在开放的游戏空间。在这个游戏空间内的事物、行动者持有的看法都与其在场域内被分配的位置有关。在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场域内,城市、国家部委和省、市政府机关各部门、行业组织(商会、协

会)、企业(管理者、职工)、职业教育培训评价组织(社会组织)、学生及其家长、非营利性的社会组织、媒体等就构成了场域内的行动者,这其中有的是团体,有的是个人,有的是资本。《实施方案》要求“全国统筹开展产教融合型城市、行业、企业建设试点”,设立了“建设50个左右产教融合型城市”并“形成一批区域特色鲜明的产教融合型行业”和“培育1万家以上的产教融合型企业”的目标。按照场域内权力关系和产教融合的吸引力,生活在社会空间的行动者可分为直接行动者、间接行动者和准行动者。直接行动者主要包括城市、政府、职业院校(行政管理者、教师、学生)、企业、职业教育培训评价组织、合作单位和用人单位。间接行动者主要包括行业组织、同类院校等。准行动者主要包括中介机构、学生家长、社会群众和媒体等,这种分类方法主要取决于行动者在场域形成过程中所处的位置。进入和退出产教融合场域的行动者各不相同,作为关系网络的始端,直接行动者国家部委各部门推动了关系网络的建立和发展,研究行动者获得资本增值的需求与期望,是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深化”的要求、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3. 行动者的惯习与产教融合场域

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是从时间维度分析行动者在场域中分配位置的影响因素。来自于个人和群体长期的实践活动经过不断的积累内化到人们的身体内、意识中,伴随着行动者的一生。布迪厄用惯习(Habitus)来表达行动者在场域里的社会位置上形成的对客观位置的主观调适,意义在于强调惯习是行动者与社会双向共时运动的相互渗透过程,并持续影响着行动者的思想和行动策略、行为方式。行动者特有的惯习既有主观性,又有客观性。产教融合场域内的行动者在各自场域内长期按游戏规则进行社会实践活动,相互之间仍没有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导致“产教融合‘四链’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链接关系弱化,甚至是断层现象,不具备可持续融合发展的物理链接结构与协同机制”。^[9]尽管惯习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总是缓慢地发挥作用,但是,惯习是具有创造性的,能使行动者应付各种未被预见、变动不居的情境。产教融合场域内的行动者相信场域所提供的酬劳,不同的行动者积极寻求所拥有的资本增值,投身到这一游戏的空间,避免产教融合场域成为“空洞的场所”的聚合。

4. 行动者的资本与产教融合场域

布迪厄提出的“资本”(Capital)指的是行动者的社会实践工具,并认为资本依赖于它在其中起作

用的场域,表现为四种基本类型,即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符号资本),不同类型资本之间具有可转换性。其中,经济资本是资本类型的基础,其他类型的资本都被先看成是来源于经济资本,后来才逐渐从经济资本中分离出来。产业场域、职业教育场域的行动者所持有的资本类型主要以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为主。在现代社会中,文化深深地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文化实践及不断文化再生产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基本发展动力。文化资本成为了一种权力资源,存在身体文化资本、客观文化资本和制度化的文化资本三种状态。产教融合场域内的行动者不但持有经济资本,而且持有文化资本,有人力资本、文化产业和文化制度三种形式。只有将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结合起来,持有的数量和质量达到显著的程度,行动者才能在场域内占据有利的位置。通过社会网络或团体成员之间的关系而获得的资本称为社会资本,由布迪厄首先提出,经过科尔曼和帕特南等众多学者的运用和发展已经获得广泛认可。社会资本虽然是一种隐形的、特殊的资源,但是所强调的互惠、信任与社会和谐的道德规范和网络系统,能够为解决问题带来更多的潜在资源。产教融合场域内的行动者或行动者群体需要凭借在某种程度上制度化的相互交往、彼此熟识的关系网积累资源,这样积累起来的资源总和就成为社会资本。在产教融合场域中,社会资本只有与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同时使用时才是有效的,建设关系网络的机制才是形成产教融合场域需要突破的关键所在。

5. 产教融合场域内的产教融合社会实践分析

布迪厄的社会实践观研究行动者的实践空间是什么、实践逻辑是什么、实践工具是什么等三个基本问题。由场域、惯习和资本及彼此之间的内在关系所形成独具特色的社会实践理论体系可以分别予以回答。产教融合场域内的行动者凭借各自所拥有的惯习和资本,不断地实践以创造和维护自身和生活在其中的场域。《实施方案》提出,探索深化产教融合机制建设要“以制度创新为目标,平台建设为抓手,推动建立城市为节点、行业为支点、企业为重点的改革推进机制”,设立“建立健全行业企业深度参与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校企合作育人、协同创新的体制机制”的试点目标和布置“健全以企业为重要主导、高校为重要支撑、产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为中心任务的高等教育产教融合创新机制”的试点任务。探索彰显职业教育类型特色的机制建设需要从实践的空间、实践的工具和实践逻辑来分析产教之

间的关系。

产教融合场域作为行动者和行动者群体进行社会活动的场所,即实践的空间,是产业、教育为争夺资本所有权力斗争的需要。产业场域和职业教育场域的发展也是相辅相成的一体关系,是在立德树人共同目标下,产业场域和教育场域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也符合张謇“以实业辅助教育、以教育改良实业、事业所至即教育所至”的“实业与教育迭相为用”的职业教育思想。机制建设是产教融合场域权力斗争的关键环节,产业场域、职业教育场域的壁垒需要建立相应的机制予以破除,现实情况却是没有建立健全有利于产教融合的机制,需要破除传统机制的障碍,建立并创新机制。

实践的逻辑是惯习。布迪厄指出它“是客观条件的一个产物”,表现出产教融合场域内行动者的现实生活和实际活动的客观实践,外化于行动者和行动者群体参与产教融合场域的策略。实践的工具是资本,即产教融合场域行动者的社会实践工具,也是基本的社会权力。“这些基本的社会权力首先是各种不同类型的经济资本;其次是各种不同类型的文化资本”,资本具有增值力量,产教融合场域之中拥有各种资本的行动者运用赌注游戏的策略进行的斗争,追逐资本的增值,表现在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资本的增值。布迪厄进一步明确,“资本是一种镶嵌在客体或主体的结构当中的力量,也是一种强调社会界内在规律的原则。”

三、社会实践理论的应用与概念工具的适用局限性

1. 社会实践理论的应用局限性

健全的机制是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首要前提。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哲学理论、社会学理论和教育学理论,众多学者不断对产教融合机制的内涵、机理、困境与路径进行分析和研究,期望建立健全机制以促进产教深度融合。运用场域、惯习和资本及彼此之间的关系分析职业教育问题具有非比寻常的优势,能够为产教融合机制建设提供崭新的研究视角。但是,一方面,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是以20世纪50年代的法国社会为背景提出来的,并于20世纪70年代末传入中国。我国教育研究领域在接受布迪厄社会学思想影响时还主要停留在介绍和选择性利用的阶段,整体理解和把握不够。^[10]另一方面,从语言传播视角来看,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源于法语,经过英语学者不断评论再到其他语种的传播,难免会产生“盲目崇拜”及“碎片化、片面性吸收”的现

象。就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实际情况而言,社会实践理论框架分析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要避免“拿来主义”。应立足于中国立场批判性地加以借鉴和本土化,按照产业规律、职业教育规律有吸收、有鉴别,边学习、边批判和边应用。

一是场域概念的适用性。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场域在于解决产教“融合”是如何发生的问题。布迪厄认为社会世界是由相对自主的社会小世界构成的。所谓的小世界,就是客观关系的空间,也就是场域。职业教育场域是从属于教育场域的次场域,是行动者进行知识再生产的活动空间,客观关系通过文化联结,游戏规则主要为了维系文化关系。尽管职业教育已经发展多年,但常常被社会看作是“教育”之前强加了“职业”两个字。职业院校办学模式常常模仿普通教育,时至今日,其自主性、独立性并没有展现出来。产业场域从属于经济场域,是行动者进行物质资料生产的活动空间,客观关系通过利益联结,游戏规则主要是为了维系利益关系。深化产教融合要求机制建设能够突破产业场域和职业教育场域边界壁垒,逐渐模糊,进而达到融合状态。但是,场域并没有描述哪个行动者处于客观关系的中心位置,强调权力结构决定网络结构,却忽略了政府的统筹作用。在政府行政干预下,我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本身具有独特性,所形成的网络结构关系,更像是一个高度同质性结构的不同组成部分。

二是惯习概念的适用性。惯习用来解决实践按什么方式来展开的问题。布迪厄认为场域与惯习的关系是场域形塑惯习,惯习成了场域的本质在行动者身体上的体现,有助于把场域建构成一个充满意义的世界。产教融合场域内行动者和行动者群体众多,单靠行动者长期形成的惯习难以构建有意义的场域。例如,企业行动者本来对产教融合没有形成惯习,产业转型升级需要建立机制来吸引其参与产教融合协同育人。行动者的主观意识对场域形成有重要作用,但场域理论排斥人的主观意识在实践中的主导作用,与近现代哲学社会科学对于人之主观能动性的认识是不一致,甚至是矛盾、冲突的。^[11]

三是资本概念的适用性。资本是积累起来的劳动,用来解决育人在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场域中呈现什么样形式的问题。呈现的形式可能是物质化的,也可能是身体化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场域内的行动者对所拥有的资本进行交换,即政府通过经济资本资助职业院校办学,职业院校通过文化资本不断提高学生身体形态文化资本的总量,实现获取社会资本和扩大社会影响力。企业、培训评价组织通过

经济资本投入到职业院校获得学生人力资本。但政府责任的失位和缺位导致职业教育类型特色不明显、对行业企业吸引力不足、职业教育培训评价组织培训不到位,使得产教融合不深入。

2. 行动者对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认知的局限性

职业教育已经明确产教融合协同育人,但行动者还没有完全形成产教融合理念,仍旧按照自身所处的场域规则和行动轨迹在运行,导致产教融合缺乏吸引力。行动者对产教融合的重要性及其社会功能缺乏正确的理解。例如,“三教改革”中“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是关键所在,但普通教育的硕士研究生学历是职业教育师资的基本要求,实践经验不足且结构比例严重失调。为了自身利益不受损失,企业不愿意让自己的骨干、技术能手、大国工匠到职业院校兼职。新型活页式、工作手册式教材建设与符合产教融合要求的教法改革何其难也。行业协会对产教融合指导不足、作用不大,一方面是话语权较弱,另一方面是对产教融合的认知不够。部分地方政府对产教融合的重视程度也无法与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相比,在城市规划、建设方面投入精力较多,而对产教融合的认识不够、支持不足,教育行政部门没有很好地发挥协调、指导、规范的作用,导致产教融合型城市建设缓慢、环境不佳。职业教育培训评价组织尚属新生事物,带着社会资本进入产教融合期待着资本获得红利,如果长期保持公益性而没有获得资本收益必然会退出产教融合。因此,职业教育模仿普通教育模式的状况并没有得到实质性改变。在产教融合意识上,行动者获得共识、建立共同目标,破除按照权力获得场域内位置的弊端。

3. 行动者内生动力的局限性

行动者有了产教融合需求、取得共识和建立总目标并不等于一定就有内生动力去实现。作为重要行动者的企业,与普通本科高等教育合作较为积极主动,对于职业教育则顾虑重重、缺乏内生动力,主要是对产教深度融合可能出现的投入和收益失衡产生担忧。作为1+X证书制度试点工作的“X”证书及其标准的建设主体,职业教育培训评价组织是一个新生事物。政府试图通过社会化遴选的方式确定什么样的社会组织、企业、培训机构满足要求。但非营利性的界定,会使得进入1+X证书制度试点的社会组织最终退出,保持社会评价组织的内生动力是极其困难的。作为职业教育办学主体的职业院校与区域产业联系紧密,如果没有合适的产业作为支撑,对于产教融合的内生动力也是不足的。学生作为接受职业教育的对象,在场域内如果不能获得真

实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提升,也没有参与产教融合的内生动力。场域强调行动者的冲突性获得社会实践空间的位置,但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强调“共商、共建、共享、共赢”,与场域理论存在矛盾点。

四、基于社会实践理论推进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机制建设

机制建设是对应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深化问题,理解“深化”的含义是首要前提。“深化”意味着职业教育推进产教融合的改革实践不断走向深入,产业先进技术、产业优秀文化、产业发展需求融入教育教学资源和教育教学过程。^[12]机制建设要突破不利于深化产教融合的机制,建立急需的机制和探索创新机制。

1. 突破产教融合场域生成的阻碍机制

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场域并不是自发形成的,原有场域的部分规则不利于新场域的生成。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场域生成需要政策场域、经济场域、教育场域、文化场域的共同作用才能实现。生成机制包括行动者引导机制、交流互通机制、内生动力机制等。

一是引导机制。作为产教融合场域生成核心行动者的政府,同样处于“元场域”内,提供政策、资金和监管,充分发挥政府的元治理作用,完成由主导者向推动者角色的转变。需要继续深入实施“放管服”改革,各行政部门之间真抓实干,下大力气修改不配套、相互掣肘的管理制度,担负起引导职业院校、行业企业、学生和社会进入产教融合场域的责任。另外,产教融合不仅是教育制度问题,也涉及经济制度、产业制度、人事制度和文化制度等,通过“职教高考制度”“人事制度”“宣传制度”等制度设计引导行动者形成产教融合惯习。

二是交流互通机制。产业场域和职业教育场域跨越边界衔接需要行动者了解各自的需求。职业教育场域内推行的1+X证书制度的优势在于书证融通,“1”代表职业教育学历证书,“X”代表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关键是“+”的交流互通,即实现整体性功能。社会实践理论提供了一个整体性特征分析框架,场域、惯习、资本互相联系在一起,单独分开都会失去意义。整合方式是交流互通,载体是产教融合平台。例如,以产业学院、行业学院、产教融合园等为平台,模式是现代学徒制、企业新型学徒制,实践形式是职业教育集团化等。行动者处在场域社会活动的不同位置,如果没有经常的定期接触、交流、沟通和探讨互动,产教是实现不了衔接和融合的。应该突破“老死不相往来”的疏离、隔阂的机

制,建立联席会议、简报交流、学习交流互动机制。

三是内生动力机制。场域内的行动者既是政策场域影响群体,也是决策者、执行者和利益相关者。场域长期形塑的惯习、占有资本的质量和数量决定了行动者根据政策压力情境和偏好采取不同的策略行动,影响着政策执行的结果。产教融合政策体现了行动者利益和价值的联结,资本增值正是场域内行动者冲突、矛盾和斗争独断酝酿与演化的重要因素。因此,产教融合场域内生动力机制要使行动者看到所拥有的资本增值的希望。

2. 构建深化产教融合场域稳定运行的协同机制

协同是指两个以上的不同个体和资源共同完成某一目标的过程和能力,包含齐心协力、相互配合的意蕴。^[13]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场域若要稳定运行,协同就需要产业与教育协商一致、协力共事。“唯有协同,才能使产教融合深化和致远”,^[14]但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场域内行动者众多,仅仅依靠长期形成的惯习、所持有的资本数量多少和质量高低来确定社会活动空间的位置具有局限性。《若干意见》指出要“形成政府企业学校行业社会协同推进的工作格局”。但缺少体现市场合作和产业分工的专业化组织,协同育人难以实现。

建立政府统筹下的关系网络体系。布迪厄的“元场域”作用指的是权力场域对场域内的斗争和各种场域的分化起着“组织原则”。“关系”是社会实践理论的核心,各行动者之间关系的建立离不开中央、地方政府各行政部门的统筹、协调和监督。一方面要打造产教融合型城市,建立产教融合命运共同体、产教“生态循环体”。^[15]产教融合专业委员会要充分发挥在职业院校、行业企业之间资源调控、统筹公共管理的优势。开展专题化的产教融合研究,深入研究产教融合推进机制。各级政府有必要规划产教融合模式,确定产教融合方向、目标和标准,协调解决产教融合涉及的产权、人力资本、混合所有制里国有资产管理三大核心问题,指导形成社会网络关系并协调产教融合的有序开展。另一方面要加强行业协会(商会)的指导能力建设,尽力打造一批区域特色鲜明的产教融合型行业、企业及学校。分类制定行业指导政策并建立行业用工需求标准和人才需求预测机制,进而对专业(群)建设进行预警和调整。

3. 创新深化产教融合场域可持续发展的机制

一是保障产教融合场域内行动者利益。《若干意见》提出要“强化企业重要主体作用”。为培养企

业长期参与职业教育的惯习,《实施方案》提出“建立产教融合型企业认证制度”来保障参与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企业的利益,同时“政府要发挥引导和支持作用”。^[16]对于学生来讲,《若干意见》提出要“保障学生享有合理报酬等合法权益”,主要还是针对其在合作企业进行顶岗实习。对于专业教师来讲,企业应鼓励和支持能工巧匠到职业院校任兼职教师;职业院校应完善符合职业教育特点的专业教师任职资格标准和专业技术岗位评聘办法。开展1+X证书制度试点工作,落实企业和职业教育培训评价组织多元治理主体地位,保障共同发挥作用,促进“1”和“X”书证融通。职业教育是人与职业的教育,通过职业教育使适龄青年能够具备从事某种谋生职业的能力。“职业人”的职业技能等级能力需要第三方社会评价,为此,要加快培育职业教育培训评价组织,通过建立遴选、考核和退出等机制来加强职业教育培训评价组织的培育。

二是创新产教融合成效评价标准体系。场域内行动者获得资本的数量多少确定在实践空间的位置,影响着关系的形成。但深化产教融合的最终目的,或者说最终评价标准,不是合作企业的数量有多少,而是产业先进技术元素、优秀文化和发展需求融入专业教学的深度。因此,进行产教融合成效评价需要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构建产教融合成效评价体系,建立产教融合评估指标体系,建立质量标准体系和质量保障体系,审定合作内容,在专业设置与改造、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定、课程教材建设、实验室建设、“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切实保证产教融合的质量。

三是创新经费投入机制。建议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在财政预算中安排产教融合专项资金,该专项资金应当随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逐步增长;鼓励金融机构开辟产教融合信贷业务;吸纳社会捐助资金。

【参考文献】

- [1]郝天聪,石伟平.从松散联结到实体嵌入: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困境及其突破[J].教育研究,2019,40(7):102—110.
- [2]安冬平.职业教育产教深度融合“双园内嵌、三维联动”模式探索[J].教育与职业,2020(4):12—18.
- [3]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122.
- [4]朱丽.突破再生产:布迪厄理论的另一面[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21,42(3):26—32.
- [5]宫留记.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J].理论探讨,2008(6):57—60.

- [6] 宫留记. 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D].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 2007: 26.
- [7] 岳敏敏, 董同强. 职业教育产教融合: 桎梏与导引——基于布迪厄的场域理论[J]. 职业技术教育, 2021, 42(1): 45—49.
- [8] 庄西真. 产教融合的内在矛盾与解决策略[J]. 中国高教研究, 2018(9): 81—86.
- [9] 张庆民, 顾玉萍. 链接与协同: 产教融合“四链”有机衔接的内在逻辑[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21(4): 48—56.
- [10] 李春影, 石中英. 布迪厄社会学思想对中国教育研究的影响: 回顾与评论[J]. 比较教育研究, 2018, 40(8): 38—47.
- [11] 谢立中. 布迪厄实践理论再审视[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56(2): 146—158.
- [12] 马树超, 郭文富. 高职教育深化产教融合的经验、问题与对策[J]. 中国高教研究, 2018(4): 58—61.
- [13] 顾绘. 产教深度融合: 学理依凭、机制内涵与实施寻径[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17(33): 8—11 + 26.
- [14] 本刊编辑部. 深化产教融合笔谈会[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18(1): 16—32.
- [15] 李梦卿, 刘晶晶. 高职院校深化产教融合的教育生态学意旨、机理与保障[J]. 高等教育研究, 2019, 40(3): 71—75.
- [16] 曹晔. 关于新时代产教融合的几点思考[J]. 教育与职业, 2018(18): 5—10.

Deep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Production-Education Integration Mechanism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Based on Bourdieu's Social Practice Theory

LIU Lin-shan

(Jilin Technology College of Electronic Information, Jilin 132021, China)

【Abstract】Deepening production-education integration and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are the directions pointed out by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for the innovative and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Driven by a series of policies issued intensively from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o local government, the two-way docking and integration of supply and demand between production and education have developed rapidly. However, affected by many factors, production-education integration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still at the superficial level, and the “two skins” problem has not been completely solved. A reasonable and effective mechanism is the key to deepening. The macro vision and thinking opportunity of Bourdieu's social practice theory on educational issues have been applied in the discussion of educational topics. This paper explains the mechanism of production-education integration from the unique thinking and analysis framework of field, habitus, capital and their relationship, breaks through the limitations of the application of Bourdieu's theory “fragmentation and one-sided absorption” and the application of conceptual tools, and deepens the construction of production-education mechanism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from the aspects of breaking the barriers of the original mechanism of industrial field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field, building a mechanism urgently needed for the stable operation of production-education integration field, and innovating the mechanism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on-education integration field.

【Key words】vocational education; production-education integration; Bourdieu; social practice theory; mechanism

(编辑/冀 盈)